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胡玉鸿/主 编
宋言奇/副主编

新型城镇化

XINXING CHENGZHENHUA

中国特色 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2

多维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解读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的政府推进与程序控制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

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实证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践与探索：以江苏为例

近现代日本的城市化道路对中国的启示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胡玉鸿/主 编
宋言奇/副主编

新型城镇化

XINXING CHENGZHENHUA

中国特色 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2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2012 /
胡玉鸿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672-0843-8

I. ①新… II. ①胡… III. ①城市化-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965 号

书 名：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2

主 编：胡玉鸿

副 主 编：宋言奇

责任编辑：周建国

装帧设计：吴 钰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印 装：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5225020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2 字数：209 千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0843-8

定 价：3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问题,在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比较深刻复杂。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有哪些特征?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为了深入挖掘新型城镇化,我们编写了《新型城镇化》一书,并设立新型城镇化内涵、新型城镇化与管理体制创新、新型城镇化与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他山之石等6个栏目,力图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以及地方实践等多维度解读新型城镇化。

目 录

新型城镇化内涵

- 多维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解读 段进军 张方华(3)
-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文化与心理适应
..... 江 波 刘彦超(11)

新型城镇化与管理体制创新

- 中国城镇化的政府推进与程序控制 孙 莉(25)
-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余敏江(35)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转型:缘起、动力与路径
..... 张 晨 韩舒立(46)
- 论城镇化进程中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二元社区形态与差异治理模式
..... 沈承诚(55)

新型城镇化与社会建设

- 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 段进军(67)
- 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苏州工业园区若干社区的调查 张 晨 季程远(75)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 FDI 集群化背景下本土企业的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研究
..... 张方华 左田园(89)

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实证研究 韩 坚 盛培宏(107)

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践与探索:以江苏为例 高 峰(121)

社会政策范式转型理论视域下的苏南城镇化发展路径 梁君林(134)

适应·转型·融入

——苏南地区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三个重点问题的思考

..... 宋言奇 杨婷婷(143)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苏南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叶战备(152)

苏南小城镇的功能提升和空间优化研究

——以张家港市凤凰镇为例 吴莉娅 段进军(167)

他山之石

近现代日本的城市化道路对中国的启示 姚传德 刘芸菲(181)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新型城镇化内涵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多维视角下的新型 城镇化内涵解读

段进军 张方华

【摘要】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仍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仍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支撑。但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城镇化的内涵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本文认为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应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相对于外生的城镇化模式,我国城镇化应转型为内生城镇化模式,要特别关注城镇化的区域视角;相对于出口和投资驱动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应建立在消费驱动的基础上;从发展目标上来看,城镇化应由实现“一维”的经济目标转型到实现基于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三维”目标。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新阶段 新动力 新战略 新目标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城镇化战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项目编号:10JJZDZONGHE02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江苏省城镇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0ZDAXM020)的阶段性成果。

2008年欧美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预示着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而这一调整过程不是短期能够结束的,因此,我国建立在出口和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容量等传统要素的稀缺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内外双重倒逼机制迫使我国城镇化必须转型,转型的实质就是寻找城镇化的新动力和新模式,也就是要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内涵与传统城镇化相比,应体现在几个方面的不同:即城镇化的新阶段、新模式、新动力、新战略、新目标。

一、从发展阶段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

我国城镇化主要表现在“化地”方面,即“土地城镇化”严重超前于“人口城镇

化”。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冒进”态势。这种冒进城镇化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乡地域社会结构,这是“社会—空间”辩证法在我国的具体体现。许多政府过分追求城镇化指标,利用行政力量,片面做大城市规模,使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一些地方“要地不要人”的问题非常严重。1996—2008年,全国城市用地和建制镇用地分别增长了53.5%和52.5%,但农业户籍人口仅减少了2.5%。2000—2008年,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用地增长率快于城镇非农人口增长率。部分地方为了扩大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背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擅自扩大挂钩规模,这些冒进措施导致强拆强建、逼农民上楼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化地”不仅表现为空间的蔓延和扩张,也表现为附着在其上的政府办公大楼、宽马路、立交桥、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将其称为“空间失控”,并指出,大规模发展交通运输建设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GDP呈两位数增长的重要支撑。2008年起,这造成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各地区的规划,全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要达到18万公里左右,许多省提出了“县县通高速”。这造成我国许多省份的高速公路的长度和密度均超过了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规划规模与空间覆盖水平背离了其技术经济的属性。远程城际高铁、大城市的城郊铁路系统的盘子过大,大项目上得过快。由于超大规模的交通规划和建设,导致交通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到7%—9%,这是很不正常的比。

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是矫正我国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选择。天平偏向“化地”,势必要投入大量资金,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导致了大量资源的浪费。我们需要矫正这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需要将资源投入到一种“化人”中来,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了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很好地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利用形式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虽然转换了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但其消费模式、社会身份没有转化,所以他们的消费贡献、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市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因此,应该把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看作是对“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半的挖掘。现在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50%,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重只有35%左右,两者之间还有15个百分点的差距,“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将有利于我国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和区

域发展内生型模式的形成。

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化地”主要建立在投资和出口的基础上,而“化人”则需要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了“人的城镇化”,不断地满足人的需求,才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还包括大量精神方面的需求,这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提升的重要源泉。我国城市和区域产业结构极为不合理,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比重过大,这与“化人”的滞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人们的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过低,是很难启动消费的。但投资驱动必然带来大规模低水平的产业扩张,也必然带来一种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如2011年我国钢产量为8.86亿吨,占全球总量的45.5%。近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钢增量在7 000~8 000万吨。此外,水泥产量也连年攀升,2011年全国水泥产量为20.99亿吨,比2010年增加2.17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60%。2011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4.80亿吨标准煤,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在2004—2011年均为2.42,2009年高达3.6。这就是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拉动的。

最后,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是回归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经过长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从价值层面回答城镇化的本质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还是“物的城镇化”。目前,虽然我国城镇化在硬件方面或已超越发达国家,但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滞后,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毫无疑问,是“人的城镇化”的严重滞后。“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不仅扭曲了社会结构,同时也扭曲了经济结构,并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结构。所以,新型城镇化应尽快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这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从发展模式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外生城镇化模式到内生城镇化模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规模型的城镇化,也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人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镇化转型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并包含丰富的内涵,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型。“后发优势”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重要战略,在相当长时期内确实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现在“后发优势”却变成一种“后发劣势”,人们养成一种心理的依赖性,缺乏一种制度创新的动力。“后发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尽管“世界工厂”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外汇盈余和就业岗位,但也形成



了“全世界污染中国”的局面,加剧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我国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后发优势”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的,也具有典型的外生型特点。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将城市发展划分为“城市营销”与“准城市国家”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种无情的零和游戏。他认为,奉献在跨国资本祭坛上的祭品通常是低廉的工资、温顺的劳动力,“灵活和敏感”的地方政府,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减免税收、提供免费土地、给予津贴等。第二种模式是“准城市国家”,城市一区域不可能期望从自身外部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动力。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固地给予它们自身的天赋资源。城市一区域的发展要想具有“可持续性”,就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它们自身的综合资源,这是不能够进口的。

我国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大批量的生产主要依靠低成本竞争的产业集群支撑,并且这种集群在全球产业链中只能获取极其微薄的利润。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区依靠的都是低成本竞争,在1996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对芭比娃娃玩具的全球生产与价值分配体系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在美国市场上售价9.9美元的“芭比娃娃”玩具,其海运、仓储、营销、批发、零售和利润环节就占了7.9美元;在余下仅仅2美元的分配结构中,中国香港管理和运营中心占1美元,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沙特阿拉伯进口和中国内地市场采购的原材料占0.65美元,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工人的加工费——在全球玩具产业的价值链上,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仅为3.5%(Tempest,1996)。但随着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这种低附加值的产业链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瓶颈问题。新型城镇化必须通过新型的产业集群提升发展的内生性,要从供应链型的GVC走向基于区域的NVC,实现全球化和本地化的辩证统一,摆脱“代工—出口—微利化—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价值链攀升能力缺失”的非意愿恶性循环的发展路径。

三、从发展动力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投资出口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变

城镇化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这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过去我们一直倡导启动内需,但内需一直启动不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广阔的外需市场空间支撑,我们没有一种倒逼机制来推动内需消费市场的启动。而且在时间点上存在着一种巧合,即每当外部出现经济

危机,我们都会把内需启动作为一种战略选择。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提出要启动内需,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房地产开发和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战略举措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内部投资弥补了外需的不足,一方面使我国摆脱了外部市场的影响,同时,投资驱动的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经济相对快速的发展。2008年欧美发达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后,我们又提出了内需战略,同时启动了更为庞大的4万亿救市计划,试图仍沿用过去的药方来医治一个病情不同的新病人,这不但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促进低层次高耗能的产业进一步扩张,以及脱离国情的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浪费大量的资源。其原因在于:1997年出口导向型模式仍然处于“青壮年”发展时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旦危机过去,便会重新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后的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我国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尾声,如果我们再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来启动内需,只能进一步强化一种结构型矛盾,因此,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就在于启动一种消费驱动的城镇化新模式,而消费驱动必须要求有良好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特别是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选择。

根据陈志武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为10.2%。我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成分后,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呈现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才增加了1.2倍。近年来,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下降却更快。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1%,资本形成率为48.3%,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5.7%。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200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3.2%,此后10年间最终消费率一路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10年为48.2%。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在金融危机后的内需刺激政策下有所回升,为49.1%。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产形成率为23%。2011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3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我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

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外部市场的萎缩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倒逼我们去改变自己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前的消费与投资的分配主要支撑着出口导向和投资的发展模式,如果转为内需,就必须相应地推动投资与消费两者比例的变化,否则,启动内需和消费驱动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时需要围绕着消费社会的建立,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消费驱动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以相应的社会结构 and 经济结构的转变作为支撑。

四、从空间上来讲,新型城镇化要由“非均衡型”城镇化转为“均衡型”城镇化,加快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优化城镇体系空间格局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空间扩张蔓延应转变为协调城乡空间结构为主的均衡的城镇化模式。以 2008 年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城市人均投资分别是县城的 2.26 倍、建制镇的 4.48 倍、乡的 7.27 倍和行政村的 20.16 倍。城镇等级体系和规模结构出现严重失衡。2000—2009 年,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分别由 40 个和 54 个骤增到 60 个和 91 个,其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由 38.1% 和 15.1% 增加到 47.7% 和 18.8%,而同期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数量分别由 217 个和 352 个变化为 238 个和 256 个,城市人口比例由 28.4% 和 18.4% 下降到了 22.8% 和 10.7%。另外,快速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在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吸附的基础上,这导致我国农村的快速空心化和农村人口主体的老弱化,同时,近 10 年来,我国城镇年占用耕地 300 ~ 400 万亩。因此,城镇化的空间均衡是中国城镇化进行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城镇化的“非均衡”突显、“城市病”出现以及农村“空壳村”问题的显露是“均衡型城镇化”的现实动因,在城市进程中以及城镇化模式抉择的形势下,实现城市的网络化、寻找最佳城市规模、实行农村“就地城镇化”、优化产业空间、促进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均衡型城镇化的现实策略选择。

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改变城镇化的空间模式,遵循位置级差地租的客观规律,不能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忽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因此,要不断地优化大城市的发展,加快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特大和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包括县城)—小城镇—农村新型社会”为框架的城镇等级体系。要科学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及中心村的建设,特别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县域城镇

化作为未来 10 ~ 15 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五、从发展目标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一维”经济目标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目标”的转变

从“土地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既体现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同时,“人的城镇化”也是城镇化最核心的目标。城镇化战略内涵更应该体现在“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城镇化作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并不应该成为实现 GDP 和政绩的工具。近几年,我国城市规划界对城市规划学科性质的争辩,其实就是对这种空间工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其争论的实质反映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哲学争辩。一些人强调“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强调“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推进城市规划的政策建构。这两种对城市规划的表述体现了城市规划思想史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所以,认识城镇化内涵必须由“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由“理性主义”回归到“人文主义”。

从发展目标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一维”经济目标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目标”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城镇化的本质。无论是“一维”还是“二维”,对城镇化的理解都有失偏颇。我们长期以来的城镇化是简单的一维城镇化,追求城镇化的“大跃进”,是一种典型的 GDP 主义主导下的城镇化,也是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以牺牲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大规模的城镇化强烈地改变了我国的自然和社会结构。但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结构的限制。郑永年曾指出,当前的 GDP 主义导向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第一,GDP 主义进入很多社会领域,错误地把社会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化”。第二,GDP 主义盛行,社会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没有社会政策保障,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更难以上升为中产阶级。所以,GDP 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

当这种“一维”的经济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受到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结构的限制,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三维”的目标下取得平衡。因此,我们倡导的“三维”目标下的城镇化新趋势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同时也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把当前过快的城镇化发展速度降下来,由于城镇化发展在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利益因素发展的同时,还受到社会公正和控制生态环

境恶化因素的制约,这使得其发展会产生“外部不经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二维空间”,更低于“一维空间”(即只要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也就是只要最大限度地经济增长)的状态。

综上所述,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生态结构具有相互的制约性和促进性。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有合理的社会结构来支撑,同时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又受到合理的自然生态结构的支撑,畸形的经济结构必然伴随着畸形的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在三维目标下的高级协调。

(段进军: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心副主任、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方华: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心副主任、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文化与心理适应

江 波 刘彦超

【摘要】 城镇化不仅要实现人的转移,更要实现人的提升和人的幸福。本文基于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文化与心理适应角度,从城镇化的社会文化内涵出发,深入分析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阐释了推进“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必要性,并从政府、社区、组织和个人层面上作了路径与方向的探究。

【关键词】 以人为核心 城镇化 文化 心理适应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成果之一。

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不到18%,上升到2012年的52%,大约4亿~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城镇化的演变过程,我国正从低GDP和低城镇化水平的低和谐阶段,逐渐转变到低GDP和高城镇化水平的过度城镇化阶段。由此可知,虽然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了,但是人的生活水平和各种需求的满足并没有跟上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产生了资源浪费、大城市病、居民生活质量不高等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人们开始站在城镇化的价值层面的角度,从城镇化后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感增强了”这一最终目标上反思,城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必须惠及人民,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因此,要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文化与心理适应,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

一、“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内涵

(一) 城镇化的内涵及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过程中物质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口城镇化,它是城镇化的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

